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回顾】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学术研究的底色	杨奎松
【乱世人生】	我家遭遇的文革“遣返”	冷文瑞
【恐怖岁月】	北京女二中留下血泪记忆	周瑾
【不堪回首】	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自愿”与“自慰”	老徐
【往事如烟】	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节选之二）	安文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回顾】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学术研究的底色

• 杨奎松 •

口述：杨奎松 撰文：陈远

（一）

我小学没有毕业，上五年级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革爆发，因为当时还太小，因此并没有正经参加过红卫兵，只是戴着红袖箍跟着六年级同学在小学里闹，主要也是看热闹。后来也没有真正参加过什么“组织”，更没去串连，充其量也就是跟着大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到处跑。

要说记忆深刻的事，当然就是死人了。

我当时所在的小学叫中古友谊小学，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被什么人安排在学校值班，晚上就睡在教室里拼起来的课桌上。那天一早起来，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吵闹，结果发现是我们学校教体育的一位男老师爬到了校园里高高的烟筒上面，好像还在喊什么。因为太高，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他要自杀。当时眼看着他跳下来，“嘭”的一声，连血都没见到人就死了。这是发生在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的事情。当时可能因为岁数半大不大，再加上和他不是很熟，这件事情倒没有给我太大的刺激。只是平时接触中一直觉得这个老师人其实不错，他为什么会去自杀，完全搞不懂。

实际上，当年学校里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事情很多。后来我曾和朋友跑到其他学校去看过，剃半边头的、挨打的、甚至被打死的，那些穿着父母留下来的发黄的卡叽布军装的中学生，系着腰带，戴着红袖箍，成帮结伙地骑着自行车，在那个时候别提多威风了。不少老师就是被他们斗，被他们打的。记得在南池子那边的一个中学里，就发生了打死老师的情况，

当时我们听说后就骑车赶了过去，到的时候。记得那个老师已经死了，被人拖到了屋子里面，很多人都挤到窗户跟前去看。

（二）

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烧“四旧”。不知道到院里来发号施令的是谁人了，好像就是那些中学红卫兵。记得当时家家都把字画和各种带有所谓迷信色彩的东西拿出来烧，在院子里堆了好大一片，里面自然有不少可能是古籍的东西。其实，家长们未必真的想烧，但是在那种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不拿东西出来烧。因为孩子们都比较积极，万一孩子知道，而家长藏着不烧，将来一旦被说出去，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幸好我们家没有什么古籍或字画，否则的话，那次一定会被我和我妹妹也都拿出去烧了。说实话，看到人家把那么多的字画拿出去烧，当时还真有些羡慕人家呢。

我想我是那种成熟得相当晚的孩子。再加上当时读的书也少，至少在今天看来是不太懂事。整个那段时间里唯一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婆婆（外婆）在那年夏天因为地主成份，被赶走了。当时大概所有北京城里地主成分的人，都被赶回乡下去了。

记得那天是我妈妈亲自去把婆婆送回到四川省三台县的老家去。我和妹妹就是婆婆带大的，婆婆又一向疼孙子，从小就比较偏爱我。可是当时我和妹妹，甚至连送一下婆婆都没送，只是站在家门口眼看着裹着小脚的婆婆在妈妈地陪护下，颤巍巍地走下楼梯，永远离开了我们。不过两三年之后，她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如果不是因为被赶走，不是回到那样一种她从未经历过的既穷困又孤独的环境中去，相信她一定还能活好多年。而关于这一点，差不多是到了后来我意识到的。现在想起来，在那样一种时代的影响下，就连孩子都会变得极其冷漠和残忍。不仅对周围不熟悉的人自杀或被杀，我们几乎无动于衷，就是对自己最亲近的婆婆，也不会表现出一个小孩子所应有的感情了。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所以没有去送婆婆，甚至没有掉一滴眼泪，仅仅就是因为知道了她是所谓的地主。其实，不要说她本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就算是地主，也不应该受到自己所痛爱的外孙的那样一种对待啊。

（三）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开始的时候天天学毛主席语录，以后上了一点文化课，程度也不高。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而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我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一个叫申英力的朋友被抽来，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

记得当时在那里负责看管羊群的是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国家计委综合局的朱镕基和基建局一位姓陈的干部。三个都是老先生了。我和申英力给他们打下手。我负责和廖季立去放羊。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把羊群赶到很远的靠近山区的一个水库坝区里去吃草。中午就啃冷馒头，晚上天黑才能回来。这个活儿虽然比下田劳动要轻松许多，但孤寂得很，整天整天没有人说话，有时候就会拿羊逗闷子。记不得是因为什么事情了，肯定是因为对羊不好吧，曾经被朱镕基吼过。因为直到他做了总理之后，还曾跟我父亲提到过我曾经对羊态度

不好的事情。你想那时候他们负责放羊，羊要是有个闪失肯定要他们承担责任。但是我们那时哪想得到这个，羊不听话，拿着小鞭子“啪”就抽下去了。

当年上学的事情基本上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去农村的经历却总是历历在目。

上学期间当时流行到农村去劳动，记得初夏的时候去过顺义县一个靠山的好像叫孙各庄的村子帮助收麦子。麦收回来之后，很快就放暑假了。我们几个同学还专门骑车从城里跑到那个村子又去了一两个礼拜。在那里是用镰刀割麦子，但是到了湖北襄樊“五七”干校那个地方，却是用手来拔麦子。最奇怪的是，两边的土质也不同，顺义这边土地的含沙量要高些，而襄樊这边却是粘土，而且一到收麦子的时候常常会下雨。因此，碰到收麦子时，必须集中一切人力下田去乘着雨还没有下来之际进行抢收。记得那一年我们也被调回连队抢收，麦子虽然抢下来了，却因为下雨都搁在地里搬不出来。最后不得不冒雨到田里去把麦子抱出来，因为土太粘，人一踩到田里，往往会把小腿都陷进去。一天干下来，真是累得骨头都散了。只是到了干校以后，我才开始觉得家里有多好。开始想北京，想北京的江米条、桃酥、酸奶……

（四）

我1970年12月一个人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为我们那一届中学毕业分配了。我们那一届和之后的七一届是当时北京唯一两届留城，而没有下乡的。连续几年把学生都弄到乡下去，城里工人店员都不够了，需要增加新的人，我们这两届正好赶上了。我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我学的钳工，一直干到1978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差不多做了8年。头三年做学徒，一个月好像是十多块钱。之后转成正式工人，后来自己也成了师傅，带上了徒弟。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四五事件，不是因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大概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工厂了。“四五事件”前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进到厂里办的“七二一”大学去学习一下。在文革那样一种环境下，能够留在城里，并且能做工人“老大哥”，已经很不错了，当然真的没有什么更长远想法。我这个人好像总是比较容易满足，不管做什么，从来是干一行爱一行，没有什么宏图大志。

1976年的“四五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当然，这事说来就话长了。简而言之，我虽然过去读书不多，中学也没有学过什么，但是到干校以后，特别是在放羊的时候，因为闲极无聊，就自己看了一些书。说起来那时候在干校这种地方也没有什么书可看，于是就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之类的东西。结果慢慢地对理论的东西有了一些兴趣。到了工厂之后，因为车间里经常开会学习，读书念报，其他小年青儿大部分都没有学过这些东西，报都念不利索，更别说懂得那些名词了。而我多多少少还能说上一些，结果就慢慢地显出来了。车间的支部书记那时候觉得我这个小家伙还算不错，也慢慢地让我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最后我甚至还参加过一段厂里的什么理论小组，见识过知识分子和工人理论小组怎么共同写理论文章。当然，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工人，我们那个工种每天的体力消耗相当大，很多小伙子不安心。我因为比较踏实，也比较上心，技术上学得较快，再加上我有点墨水，车间里就让我来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因此，那个时候我用休息的时间，拉了一帮年轻工人一起玩，一起看书，北京市机械局还曾经因此表彰过我们这个学习小组。

因为那个时候学的都是些理论的东西，自然也就对时事政治非常关心。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一些平时读书读得多的人慢慢地感觉到了一些问题。当时恰好开始在内部翻译出版一些西方的理论书，包括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著作。把这些西方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对照起来之后，思想上想的问题自然也就更复杂了一些，对于文革、专政以及社会主义等很多问题，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们在工厂外面有不少读书的朋友，不

仅相互交流读书笔记，而且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观点。由于当时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对一些传统观点的怀疑了，因此不能不悄悄地进行，不敢让人知道。我现在还留得有当年为了这种讨论而写的关于何谓社会主义之类的理论方面的文章。正是从怀疑文革开始，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开始深入地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讲的、列宁是怎么讲的，从老祖宗那里一点一点地去探讨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然后比较毛泽东的说法，指出他们之间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

正是因为接触这种人多了，怀疑多了，因此对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自然也就变得很敏感。周恩来一去世，我们就感到要出事了，我们马上就投身到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中间去了。记得那时几乎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去。过去我在厂里一直是典型的好工人，并且当过先进生产者，这时候却一连多天请假不上班。我后来事发主要出在写诗上。当时我写了好几首诗，其中四首诗是由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用毛笔抄出来张贴到广场上去的。诗的内容记不大清楚了，后来出的《天安门诗钞》上都有，其中有一句记得比较清楚，叫“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

4月4号那天，我一天都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的阵势已经能够感觉到出事了。我那天因为白天呆了一天，始终没有吃饭，本来晚上还想守在广场上，想看看他们怎么清场：有那么多的花圈，有那么多的人在守花圈。好像是晚上6点左右，北京市长吴德通过扩音器在广场发表了讲话，意思说要清场，要大家离开广场。讲话播了一遍又一遍，我当时一直在那里等，一直没有动静，因为太饿了，最后还是骑车回家去吃饭去了，等到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再去时，广场就进不去了。因为被拦在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后来只好骑车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早就又赶到广场，当时花圈已经被搬空了，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种种蛛丝马迹，试图了解头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久就又有群众送花圈到广场来了，一拨又拨，扛着花圈就往纪念碑上放，群众大声欢呼、鼓掌。然后就是大批青年人在广场上手挽手游行、唱歌、喊口号。不知道是谁高声喊道，说是天安门东南角小楼里还有被收缴的花圈，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把小楼团团围住，并试图冲破警察设置的防线。由于那里是官方的一个什么指挥部，最终人群冲了进去，并且好像有人放了火。我在这一天依旧一直看到晚上五六点钟才回家去。因为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上班了。没想到，刚一进厂门，正好赶上厂组织的工人民兵集合，每人发一根镐把，去广场旁边的中山公园集结。我当即被拉了进去，然后被从后门拉到中山公园藏起来躲在里面，准备参加镇压行动。后来才知道劳动宫也有大批工人民兵。原因是上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说是外地有大批不满的民众得知广场花圈被缴，要来声援北京市民，正大批往北京赶来。公安系统从天津就开始堵，一直堵到北京站。因为害怕万一堵不住，于是就把北京各厂的工人民兵调出来做预备队，准备在广场一拼。殊不知，里面不少工人民兵其实和我一样，这些天也是广场上的常客。我们怎么会去参加打人？当然，我们在中山公园蹲了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纯粹是上面的人草木皆兵。

我知道我被挂了号，是在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开群众大会，批判“四五事件”，说是反革命事件。刘传新并且念了几首他认为最反动的诗，其中就有我的一首。后来各单位下发拍照的反动诗抄，要求人人对笔迹。我的两首诗上了榜，记得分别被编号为“016”和“078”。因为我的那个抄诗的同学在单位比较活跃，经常写毛笔字，因此后来真的被人检举出来了。警察先是把我的那个同学抓了，当晚就把我抓了。

我先是被押到“炮局”，关在一个单间里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等到再提我时，就被押到了我们厂专门为我召开的一个全厂工人批斗大会上。他们专门找了我原来学习小组里的好朋友在大会上宣读批判稿，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被两个人架着

胳膊，压着脑袋，向人民低头认罪。大会批判完毕，在群众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口号声中，我被重新押回到车上，然后当即送进了北京第一监狱半步桥看守所。

半步桥看守所是过去日本人留下来的旧监狱，里面有两座关押犯人的楼。一座楼层高些，关押的人多，因为从空中看起来像英文的K字，因此大家叫它K字楼。我住的那个楼在空中看起来有五个爪，像个王八，所以也被人叫做“王八楼”。进到这里面之后一连几个礼拜，几乎是天天审讯。那些警察显然是奉命要找后台的，因此一心就想在我们那些人身上抓出幕后的黑手来。在我这里，他们显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因为我进去的比较晚些，相信他们通过过去的审讯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也没有太过为难我。在停止了审讯之后，我们在监狱的号子里就只剩下自找乐子了。王八楼的号子较小，勉强可以睡下三个人。而为了怕政治犯相互影响，通常都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和我关在一起的一个是4月4号晚上被抓进去的一个完全无辜的青工，既不关心政治，也不会什么诗歌。只是因为那天晚上他师傅想去广场看看，他便也跟着去看热闹。正好赶上当晚清场，他和他师傅就一起进来了。因为岁数小，吃得又差，因此动不动就哭。好在关到9月初，他就被放出去了。另一个一直和我关在一起的是个惯偷，只因为被定性为坏分子，放到农村去接受管制，忍受不了，偷听了台湾的广播，写信去和那边建立联系，也成了半个政治犯。因为他蹲监狱的次数多，见多识广，他一直认为我弄不好会被枪毙，自认为自己的罪过不大。想不到最后我出来了，而他却被枪毙了。

监狱里的生活证实了对自己容易知足的判断，因为即使在那里，每天三顿饭只有两个窝头一碗清汤寡水的稀粥，外加两勺几乎不见油星的煮青菜，我也没有觉得有多苦。既不担心被枪毙，也不奢望被释放，每天就盼着放风的时候，到院子里的一个可以看见天的四面是墙的号子里，去伸展伸展胳膊腿，跑几个来回打羽毛球的步伐。即使是唐山大地震，房子东摇西晃，到处都是尖叫声，同号的青工急得直哭，我也一样听天由命，从没有着急。真的开始想什么时候能出去的问题，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了。因为在监狱里听到了哀乐，估计到大概是毛泽东去世了。以后又听到外面大喇叭里广播打倒了“四人帮”，自然也就知道自己的事情将会有结果了。这以后一直拖到12月，我们才被放出来。只是当时也还没有痛痛快快地放，而是先办了一个学习班，把被释放的人集中在一起，拖了两周时间才各自交原单位来人接走。自然，厂里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怎么开大会斗争我，怎么开大会为我平反。后来工厂确实开了一个全厂大会，借着声讨“四人帮”的名义，为我平了反。

（五）

我宣布平反之时已经是1977年初了。不久我就回厂上班了，继续做我的钳工。没有多久就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因为我刚从监狱出来，过去又没有学过数理化，就是语文历史地理之类，也没有学过科班的东西，何况还要上班，因此，父母虽然极力主张我参加高考，自己却毫无把握。

当时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东找点书西找点书自己看，完全不知道考什么和怎么考。所以紧紧张张准备一番，一考下来自己就知道考得不好，首先数学就没考好。第一批录取时，自然没有录取到我。想不到第二批录取时，我的成绩刚好在分数线之内，竟被录取上了。只是，当时打电话通知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专业。因为父母都是学经济的，所以我的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当时唯一跟经济沾点边的政治经济学，只留了一个专业报的是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的历史专业。至于中共党史，我从来就不认为它是历史，而且也不认为有学习它的必要。因此，得到消息后，我确实很犹豫，不大想上。当时还特别回家去和父母商量过。显然，当时如果能确定高考还会继续进行的话，他们也多半会要我再等半年，再考一次的。

我妹妹也是和我一起考的，这一批没录上，半年之后就如愿考上人大工业经济专业了。但是，那个时候文革刚过，在有过张铁生事件的教训之后，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商量的结果，家里人还是鼓励我先上了再说。就这样，我就从一名工人，成了大学生，只是自己当时并不喜欢这个专业。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其实并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而是人民大学的。因为人大文革中被取消，校址被二炮占了，文革后复校较晚，没有赶上列入招生名单，因此临时用北京师大的名义和校园临时恢复招生和办校。等于我们招进去时是北师大的学生，半年以后才回去人大校址去办校。而那个时候，学校连学生宿舍都没有，好在招的都是北京的学生，大家基本上都是走读。

进入人大党史系算是我跨进历史研究这个行当的一个起点。但是说实话，我一直不认为专门设立一门中共党史专业有什么必要，特别是它还是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划在法学的门类之中。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共党史的教学太过强调理论，除个别老师外，通常很少传授历史学的知识和进行史学研究的训练。我刚开始学习时最感兴趣的就是人大历史系讲中国通史的老教授郑昌淦先生的课，郑先生是尚钺先生的学生。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古代史，但是为了听郑先生的课，我还是不止一次地专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以便和郑先生讨论。

在人大时我另外喜欢读的一门课是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读这方面的马列著作读得较多，另一方面是当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于老师思想很开放，也乐于与我们一些喜欢这门课的同学进行交流和讨论。在人大上的其他的课程，我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多半都还给老师了。老实话，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小学的时候在班里是出了名的淘气，经常被找家长。记得有一次因为怕被告状，放学后一晚上没敢回家，躲到同学家楼道里睡了一夜。中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没少给老师和父母惹麻烦。父亲之所以把我带去干校，也是因为害怕把我留在城里，跟坏孩子学坏了。上大学也没好多少，因为讲的有些东西自己不喜欢，也就经常会和老师争论，甚或给老师出难题。包括对考试，自己也常常不按老师的要求去答。记得一次考试，我认为教科书和老师提供的答案是错误的，就按照自己的看法进行了论述，结果被判为不及格。后来还是因为这种情况会影响全班的成绩，班长和课代表专门去找任课老师进行疏通，最后才勉强给了我一个及格。

当然，人大中共党史系里也还是有学问上比较不错的老师的。像彭明老师写的《五四运动史》，就花了不少死功夫，做了大量的考证，是中共党史系老师的个人成果里面少有的写得比较扎实的著作。另外教思想史的林茂生老师，也是很有才气的一位老师，和他讨论交流是一种享受，只可惜他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像和他聊天那样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另外像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杨云若，也是那种比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老师，他（她）们的治学态度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

至于说到我的史学训练，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也还是认为自己是半路出家，属于半瓶子醋。尽管我毕业以后这么多年，看了不少史学的书，也一直在努力按照史学的方法做研究，但是，和科班出身的同行们相比，我的基础肯定是差的。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考研究生。当时一个想法是觉得当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学，再读下去，时间浪费太多了，必须要赶紧开始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中共党史这个行当里，没有老师能够指导我。我宁肯自己去看档案、看资料，自己去钻研。说来也奇怪，当时我完全就没有想到应当去读历史。不过，也恰好是这样，否则我可能也就要改行了。因为一旦去读历史系的研究生，多半也就研究不了中共党史了。而一旦转去研究其他历

史，花费了几年时间，再想回过头来深入地做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光是资料积累就跟不上了。

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选择。正是因为我没有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作编辑。在那里不但能够看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为在党校，还能够看到当时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档案。所以进入党校之后对于我深入地“钻进去”影响特别大。我从到党校开始，就下决心要做系统全面的研究。我的计划从是社会主义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发生影响，它怎样促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产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开始研究起。因此，进入党校之后我就开始下大力气做“社会主义传播史”，想弄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我组织了几个同学，坐着坐铺去了全国各个城市，去那里的图书馆，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关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所有跟社会主义传播和宣传有关的资料或者复印回来，或者抄写回来。显然，学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绝对不是中共党史专业要求的研究方法。包括我进入党校时，教研室主任也是这样跟我们讲的：所有涉及到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答案和结论都在《毛选》里面。一个好的党史教学工作者，就看他对《毛选》熟悉到什么程度。研究中共党史，或讲授中共党史，不要去讲你认为如何如何，而是要对毛泽东怎么说能信手拈来。然而，从我做毕业论文时开始，我就注意到，中共党史过去所以总是变来变去，以至失去世人的信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从史料，以及对基本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出发的，而是从结论出发，为政治服务的。

（六）

在中央党校里，印象最深的是《党史研究》编辑部主编何明先生对我的放手和信任。照理，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按照以往的习惯，新来的大学生通常都是从事一些打杂的事情，包括打水、抄稿子，帮助教授们查资料之类。至于发文章，更是想都不要想。但是，我到编辑部之后，很快就开始正式承担编辑业务，处理稿件，并且何明先生也从不反对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到党校不过三年，就接连出了不少东西，被破格评了讲师。自然，这种情况也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记得1984年档案法通过后，我打报告要求去中央档案馆查看档案。没想到副校长竟批了。我也因此成为当时去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最年轻和级别最低的研究人员了。此前，能够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基本上都是够一定级别，并且有一定任务的人员。我经常出现在中央档案馆里，我们教研室里个别老先生就看不惯。记得其中一位先生特别告诉中央档案馆中央处的负责人，要他们对我特别注意。结果弄得档案馆中有的负责人对我像防贼似的，甚至乘我不在时偷偷去检查我的书包等衣物，怀疑我会夹带什么东西。有一年美加历史学会主持者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年会，有位老先生马上就告诉中央档案馆说不应该再允许我看档案了，因为我要出国，要小心我会把档案透露到国外去。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虽然在中央档案馆里断断续续查阅了几年时间，摘抄了许多东西，最后大部分都被他们扣下没有允许我带出来。但是，严格说来，我也从不因此就抱怨或记恨谁。我深知能够有我那样一种经历，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尽管许多资料被扣，许多心血白费，花了几年时间仔细阅读那样多的至今尚未完全开放的档案，就已经使我获益不浅了。这以后我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专著和论文，揭示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史实，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其实恰恰是得益于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内幕的情况。即使我不能直接引用它们，但是我依旧可以以它们为线索，找到其他的更多的被淹没有历史痕迹。

◇ 附：陈远：手记

在见到杨奎松之前，我听到过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评价：“杨老师讲课，没有多余的词儿，都是真材实料，顶多加几个字的评价，也不过是‘厉害’或者‘真厉害’。”听完这话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后，我见到了杨奎松。

在我跟他聊天的两个小时之内，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是把力量蕴藏在平淡之后的叙述。杨奎松的经历，在他的讲述里平平淡淡，在我听到的故事中却数的上惊心动魄，原来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可以用这种平淡的方式来叙述，也可以平淡的有如此力量！

之所以说杨的故事惊心动魄，是因为他的经历牵涉到当代史上的大事——1976年的“四五事件”，在很多的叙述里都是寥寥数语，语焉不详。而杨奎松的讲述虽然平淡，听完之后，仔细品味，竟然都是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这种讲述的风格一如杨奎松研究的风格，通过我的阅读经验，杨奎松的著作几乎都是这样：不轻下断语，所有的论断都建立在大量扎实的材料之上。关于研究方法，杨奎松写过一篇《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那大概也可以看作杨奎松研究方式的夫子自道，其中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是值得借鉴的。

~~~~~

## 【乱世人生】

### 我家遭遇的文革“遣返”

• 冷文瑞 •

〔原编者按：文革北京有十万“黑五类”被押送“遣返”回农村老家，冷文瑞一家老少六口就在其中。在文革研究领域，“遣返”这块几乎空白。作者冷文瑞是我小学同学，我还记得每天一起去上学的情景。今年5月冷文瑞通过“熊窝”公号联系到我，阔别半个世纪的小学同学见面了。然后在我的极力鼓动下，她用微信把下面的文字一段一段发给我（她不会电脑哦，用的是儿子淘汰的手机），我再一段一段贴出来。——小熊〕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五十四中初三的学生，是班里共青团支部委员、班长。1966年9月，我和奶奶、父母、还有两个妹妹（初二和小学三年级）一起被红卫兵从北京的家中押送回山东农村老家，直到14年后的1980年底，落实政策，我才离开农村，被分配到乡镇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如今50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

#### （一）母亲做“居委会主任”惹的祸

我的母亲是个从农村出来的普通家庭妇女，她识字是进城后在街道文化扫盲班学的。1963年我家居住的崇文老居民区要拆迁民房建光学仪器厂，我们被政府安置到和平里和平街的新建楼房居住，当时那一带还很荒凉。我们十几户拆迁的老街坊住的是属于中国作家协会宿舍楼区域的两个单元。不久，母亲被街道办事处委以作协居委会主任一职。

母亲因担任居委会主任的工作而与我家楼上的邻居结怨，这家女主人姓滕，在化工部工作，开始她与母亲走的很近，说起来是与我们老家的村庄相隔不远的山东老乡。后来滕某因与单位的矛盾和抵触情绪在家里泡病号，化工部的组织部门通过街道办事处找到了我母亲这个居委会主任，上门了解她在家长期不上班的情况。一来二去，母亲就被滕某恨上了。

滕某是山东老区出来的17级干部，颇有政治头脑和心机，对本单位处理她怀恨在心，转嫁到对我母亲的报复上来，她使用的恶劣手段是专程回到山东老家，找到我老家的村治保



主任，通过送礼让他写了一份我母亲是“地主成分”的证明信，派出所仅凭滕某交来的这一纸证明，便将母亲定为“地主分子”，免去了她居委会主任的工作，时间是在文革前的1966年春季。

起先我们家特别是我父亲对农村的成分划分并不是很清楚，我奶奶家是地主，母亲家虽然是中农，她16岁嫁到我奶奶家生活3年以上也算是地主了？经过这次劫难我们才知道，由于老家山东掖县是老解放区，1937年就已经土改，到母亲1939年结婚时，奶奶家已不再具备所谓地主的“剥削”条件，老区政府还分给嫁过来的母亲三四亩地，四间草房。

母亲“不是地主”的平反结论是在1979年1月26日宣布的，父亲的记事本上记着，和平街办事处在中央乐团排练厅，为我的母亲刘淑欣，还有在母亲之后做居委会主任的王实秀等人召开平反昭雪大会，有300多人参加。关于母亲的审查结论是：刘淑欣曾任居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前被打成地主，经调查确系错案，予以平反。王实秀是个老革命，退休后热心居委会工作，她丈夫也是老革命在北京市委。我们家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后，王实秀被活活打死了。

## （二）我家在文革初期大祸临头

文革来了。住在楼上的滕某在楼道里给母亲贴了“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整天肆无忌惮的谩骂，上楼下楼踢我家的门，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她还伙同街道居委会的造反派，往我们姐妹的学校里和父亲的工厂都发送了黑材料。父亲是厂里的基层干部，中共党员，我家兄妹五人（我们姐妹三人上面还有一个大姐和大哥已经工作）除了小妹小学三年级，四人都是共青团员，关于奶奶在土改前是地主成分，我们从未隐瞒过，入团组织上要审查出身，“考验”的时间也比别人要长。

母亲被剪了阴阳头，居委会的造反派和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在楼前的院子里召开母亲的揪斗会，我们姐妹陪斗，亲睹他们让妈妈下跪，用皮带抽打，几十年后母亲一直记着用皮带抽打她的人，其中有我的同班女同学，父亲也记着我同班的红卫兵去我家抄家的事情，我早就原谅了他们，对父母说，如果我“有资格”参加“革命”，还不是和他们一样？！

1966年9月的一天，在又一场揪斗会后，我突然看到父亲也从他的工作单位被人押回了家，原来是派出所与居委会决定，要将我奶奶、我妈、我爸、我和两个妹妹——我们全家6人的户口全部迁出北京，一起轰回老家去。我父亲13岁离家当学徒，做店员，解放后是织布厂的会计，公私合营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国营单位的基层干部。他厂子的领导对文革运动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也是造反派说了算，因此没有人敢“包庇”他这个“阶级异己分子”。

后来听一些同属被“遣返”回乡的人说有安家费，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的安家费。两个行李卷是全家的被褥，我们姐妹各自包了几件衣服，奶奶和妈妈是“地主”，连随身衣物也不许拿，就这样在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时辰到了火车站，负责押送我们的红卫兵大概是派出所叫来的，过去与我们没见过面，他们只是执行任务，所以一路上对我们的态度还好。

火车车厢里混乱不堪，全都是挂着牌子的“黑五类”分子和押送的红卫兵，几乎没有下脚处，我们只能挤在一起站着。奶奶已经80多岁，她那封建社会裹的小脚根本就站不稳，我们向押送的红卫兵求情后，奶奶被允许坐在被褥的行李上。

我在车厢里看到一个留着雪白长胡须的老者，非常显眼，他那个特别的胡子在当时是太少了，倒是真像电影《槐树庄》里的老地主。他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反革命分子滕子超，名字打上红X。不卑不亢的样子，满不在乎的神态，让我很是吃惊。回乡一段时间后，才听说滕子超是北平商会的重要人物，抗日和支援解放的鲁籍资本家，给共产党捐粮捐款，贡献可是不小。

也许是文革这些日子在北京经受的抄家和陪斗太让人胆战心惊，上了火车我们姐仨的心情反而舒展了，回老家去，希望能躲开北京那无休止的侮辱和歧视，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向往。我们被押上火车是在晚间，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还有三四个小时长途汽车的颠簸，第二天的晚上六七点钟，一家老小才到达原籍山东掖县的冷家村。押送的红卫兵把我们交代给村里就离开了，说是去找当地的红卫兵接待站住宿。

大队部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公社工作组的驻点干部，其余都是大队党支部的支委。公社工作组干部一看我们是北京轰出来的，当即表示，先让他全家游街示众！但是老支书反对说：“他家是地主不假，但不是逃亡地主，更不是恶霸，他家是在土改结束后才去北京的”，他又指着我说：“他十几岁就出门了，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经不起游斗，这3个孩子更算不上什么”，其他支委一致同意老支书的意见，不让我们家人游街。几年后老支书成了我的公公，我嫁给了老支书的儿子。

### （三）我当地富子弟的青春岁月

我家6口人回到冷家村后，村干部出面，找到冷氏家族的一个大爷，告诉说不要有顾虑，动员他家把平时盛柴草的四间房，腾出两间借给我们住，全家这才有了落脚之地。这房子没有院门也没有规整的院墙，只有一小截残缺的土坯墙，四间北屋，除了房东存放柴草的，奶奶和我们姐仨住一间的大炕上，里间是小套间，一个小炕爸妈住。冬天灶火做饭炕上取暖，有限的一点点火焰，热度过不去里间，爸妈睡的小炕总是冰凉冰凉的。

1966年9月正是大秋时节，一切农活儿都得从头学起。只要生产队长出工的哨音一响，父母就带着我和大妹，立马出工去。干农活儿从头学起，我和大妹从不喊累叫苦，咬牙坚持想要证明的是，我们即使被遣返回乡，也不输农家子弟。田间地头休息，大妹大大方方地清唱样板戏，受到乡亲的欢迎。评工分给我们姐妹9分以上的壮劳力的高分，尽管实际上还是有差距的。

父亲和我们姐妹俩都算壮劳力，经常安排的活茬儿都一样，难堪的是，我家没有劳动工具。由于遣返回乡没给我们一分钱的安家费，吃粮烧草还要靠亲戚邻居的接济，所以没钱置农具。我和大妹不怕干活儿，就发怵向别人借家什（农具），因为农民把自家农具看的很金贵，使用会有磨损，这正是我们最感难受的，经常逼得父母要去好几家才能借到。在北京的大哥大姐工作时间不长，工资很低，每月留下自己的最低生活费后按时寄钱回来的时候，我和大妹就吵着让父母宁肯少买粮，也要添农具。

那些年村村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平日自编自演小节目，冬闲时排演山东吕剧版本的现代戏，《红色娘子军》、《红嫂》等等，这是农村的主要的文化生活。我和大妹是北京的中学生，普通话和表演都占优势，虽然我们的地主成分只能演配角，但是他们需要我俩参加排练演出。有天晚上从宣传队回家，我摸着大衣口袋里有一封信，拿出来凑在煤油灯下毫无顾忌地读起来（平时家里不管谁来信，都要读给母亲听）。读着读着只觉得心跳加快，两个妹妹嘻嘻哈哈笑着，原来是本队一青年向我表白、求爱的信，妈妈没有作声。

这个青年的父亲就是我们刚进村那天见到的老支书，他的两个哥哥已成家，下边还有一个弟弟。嫁给他连个像样的住处也没有。可我自己的这个家庭出身已经让我伤透了心，如果在农村扎根，就要找个正直、实在的人，其他都是次要的。我的性格谨小慎微也可以说胆小怕事，他的性格耿直义气，好打抱不平，我俩性格上的反差是一种互补。

因为我的关系，他失去了个人发展的某些机会。农村每个家庭的阶级成分是根深蒂固的铁板一块，过去在北京，我的出身是“职员”，根据父亲是国企的干部，农村不说出身只讲成分，农村的成分是以“户”划分的，同为一户，奶奶是地主，父母、我们以及后代子孙都脱不了“地主”的干系。与我恋爱后，他先是失去了参军的机会，后来作为青年团书记和民兵连长，他又成为了入党的培养对象，公社组织部来人同他谈话，问他是否交了个地富子弟的女朋友？让他重新慎重考虑一下（意思是组织上认为不可以），经受住组织的考验，他回答说，这个媳妇我娶定了，不用考验了，我不入党了。

由于双方家庭在经济上都非常困难，我们结婚没钱按照农村的习俗走媒人定亲、大办婚礼的排场。1973年底的时候我父母已经回到北京，我俩借着探亲父母，就算是旅行结婚了。（完）

□ 来源：“熊窝”公众号

~~~~~  
【恐怖岁月】

北京女二中留下血泪记忆

• 周 瑾 •

尊敬的王友琴教授，您好！

我在去年看到您的文章，此后一直关注有关信息，包括近来干部子弟道歉等。

我也许和您同龄，六六届初中，我当时就读于北京女二中，您文章中提到的曹天翔先生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另外一位董尧成是我们从初二到初三的语文老师，去世时应该是二十六岁。董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写一手很漂亮的板书，面对一班女生，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笑容。他是从学校宿舍跳楼身亡的。有传言说他先在家里扼死了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然后到学校跳楼，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

◇ 大家记得二十六岁的董老师之死

这些年同学聚会时总会提到董老师，大家都记得他，都对他的命运唏嘘不已。有关董老师的家庭身世我等一无所知，只是觉得一个大学毕业不久、被选入重点中学任教的年轻教师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无限惋惜。我一直想知道究竟董老师遭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才导致他轻生，而是否最终会有人站出来向他道歉？

女二中当初也有几个上了天安门、红得发紫的干部子弟，也有一批造反造到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我曾经透过食堂的门缝看她们批斗跪在饭桌上的齐淑荣校长，在白发苍苍的校长身上泼了浆糊，糊满大字报。在当时那种极为嚣张恐怖的气氛中，除了她们自己圈子里的人站出来，没有人敢阻止她们，因为谁敢站出来，谁一起完蛋。

事实上，因为反对红卫兵的暴行从而引发红卫兵更加残酷的报复的事情并非孤立案例。这也是我看了宋彬彬等人道歉以后想到的。我相信宋彬彬她们没有亲手参与殴打校长，但是当时，以她们红色公主的身份和在学校的声望而言，如果及时出面阻止暴行的继续实施，应该能够在那天救卞校长一命。

◇ 母亲跳楼残疾精神失常度过一生

尽管我相信，和于小红姐妹的母亲一样，卞校长的命运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宋彬彬们道歉中提到因为工作组撤离，她们不知所措等，这个理由很难为人接受。她们的默许或许甚至是默许纵容了残忍的暴行，唯一可以谅解的只是她们当时还太年轻，也许没想到那样的暴行能致人于死命。

您在文章中提到“西纠”的通告导致近十万人离开北京。这里面有我的同学。她们随被遣返的父母“回乡”（她们其实是在北京出生长大，根本无“乡”可回），很多年后她们携家带口回到北京，谈起在农村的遭遇，每每令我汗毛倒竖。这一段历史也是血泪斑斑，犹如噩梦。

红八月暴力得到了纵容，暴力行为此后继续横行，造成了无数人的受难和死亡。我的母亲当时在一所中专学校担任外语培训班教员，被培训班学员揪斗后，又被长时间隔离审查，期间被迫重体力劳动，在无休止的检查交代和恶劣的营养中精神失常，跳楼逃跑导致四肢粉碎性骨折，成为重度残疾。我母亲即将满九十一岁了，半生在精神病和肢体残疾中度过。

◇ 希望北京为文革死者建立纪念碑

再次感谢您的工作，您的工作使我们的老师不致被历史遗忘，得以列入文革死难者的名单。希望将来能在北京为他们建立一个纪念碑，我和我的同学和我们的后代一定会给董老师和曹老师送上小小的花圈，我们一定会去祭拜那些屈死的冤魂，就像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人去祭拜纳粹集中营的遗址，那是德国人至今仍在流血的疮疤。

顺便说一件小经历。一位德国教授曾经顺路带我参观魏玛城的歌德故居。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一位退休律师听，他马上问：他带你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吗？我说，没有啊，奥斯维辛在那里吗？一向举止高雅的老人马上啪地一声拍了桌子：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带你去，他们只会给你看光彩的东西！——这就是一辈子活在忏悔和反省中的德国老一辈人。

我们真的渐渐老了。除了给后代留下一些物质遗产以外，还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呢？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让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回到那个愚昧、暴戾的年代。我希望女附中同学们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还原一个真相，不仅仅是在卞校长遗像前祈求某种心灵的救赎，而是发出一种“警世钟声”，那才是给历史、给后代留下的无价的精神遗产。

顺祝全家过年健康、顺利！

同学周瑾敬上

~~~~~

【不堪回首】

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自愿”与“自慰”

· 老 徐 ·

## 一、为什么不谈谈我们曾经干了些什么？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心里很沉重。

当成千上万曾经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回到城市以后，在这些人都进入到了老年社会的时候，众多的自我回忆林林总总，目不暇接。但是我们看到多数的回忆基本上不是对于那个年代里如何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激情，就是在农村里吃苦、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等等。

很少有反思、反省的话语。

在“文革”这场浩劫被发动的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的人更多的是在谈论是国家层面的是是非非，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分析、批判甚至谴责。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亲历者的自我反省。好像都是清醒者、局外人，甚至是先知先觉者等等。似乎只是发动者的责任，参与者都是被迫的、被动的，没有任何责任的。

还是一样，很少有自我的反思和反省！

在40年前“文革”在概念上的结束时，我们看到了曾经在十年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的控诉，以及到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终于能够回城以后，大家异口同声地把这一切罪恶的账都算在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从成千上万的冤案被平反以后，到清算“三种人”的“揭批查”运动里，一切都是这些“文革”的新贵们的罪行。

那么，所有在这些年代活过来的人，自己曾经干了些什么呢？不愿谈，不想谈，不会谈。在一阵愤怒声讨以后，这些灾难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 二、“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自愿！吴道平在《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南方报网》）中说：“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那么，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该不该肯定或者是否定呢？

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以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开始的。“很有必要”成为当时动员滞留在中国大陆中学里将近400万学生的一句口头禅。因为“很有必要”，也就意味着你必须上山下乡。更何况那是一个“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

“文革”爆发前在50年代开始的上山下乡，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需要继续延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只是前者因为是计划经济年代初期出现的种种弊端，在国家包揽一切下，无法安置多余的毕业学生所采取的一种办法。这与“文革”爆发以后，中国

历史上罕见的全国停课，工农业生产全面停滞，城市无法安置滞留的学生有所不同。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所谓“革命”，一场浩劫！

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的刘小萌教授在2014年3月26日接受《共识网》的采访时的那篇文章《不要美化“上山下乡”》里讲得很深刻——“因为绝对讲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觉得都不准确。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毛泽东极左的那一套，这场运动不一定能够发动得起来，即便发动起来，延续时间也不一定那么长，也不一定发生那么多现在看起来非常怪诞的现象。可是要强调是缘于个人的因素，实际就回避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制度的原因。从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发展、到最终失败，充分证明这个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这是我在《中国知青史》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

他进一步指出：“我在书里确实强调经济的因素，但是我指的‘经济因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策，还包括经济制度。为什么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是一个经济因素呢，首先是由于就业的压力才提出的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都知道，这场发生在“文革”高潮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前因后果的。

前因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得到了伟大领袖的积极支持，为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果是一句话决定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搞了三年文革，全国的学校有三届毕业生没有安排。上山下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了。

于是就有了这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三、当时你不自愿行吗？你敢不去上山下乡吗？

以云南农场为例，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7年开始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10余万知青被动员到云南参加支边建设。都是自愿的吗？如果是自愿的，为何在1978年举起“我们要回家”的旗帜大返城呢？！

但，确实是存在自愿的。

在云南农场有着著名的“北京五十五”。简而言之就是从北京来云南农场的55个知青。这些“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最早的弄潮儿之一，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

在那场运动中，其中的一些人从革命的动力在一夜之间丧失了红卫兵优越感，高干子弟的光彩随着父母的被打倒后消失殆尽。迷茫之中他们要重塑自己，要证明自己的阶级忠诚和找回已失去的优越感。1966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大串连”时留下的记忆被重新点燃。一种豪情油然而生：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进口橡胶很困难，我们一定要种出“争气胶”。于是他们是在揣着首都东城区红代会的介绍信再次去云南探路，想在那个新的天地里再现自身的价值。

1967年11月27日，当他们从当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冬民那里得到消息，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时。几位带头人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匆忙中他们找到了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终于找到了机会，这份报告交到了总理的手中。第二天上午，这些红卫兵们终于得到了回答。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经过北京市革委会与云南省联系，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

这些豪情万丈的红卫兵们是1968年2月8日启程。出发前，55个人列队到天安门前毛泽东画像宣誓辞行。铁道部门根据上级指示，专门调拨一节车厢供他们使用。到达昆明后当地党政官员夹道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云南省军管会考虑到武斗的形势，特意派了一个武装班护送他们。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被分配到疆锋农场。

这段经历一直是55位北京知青的骄傲。

这是自愿的，是那个年代青年学生被焕发起来的激情。

最终，在蹉跎岁月中“北京五十五”两死一疯。也有的人很快青云直上，被结合到省革委会领导班子中。两极分化。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一大批老干部解放，他们的高干父母复职，通过各种渠道将他们调离云南。只有极少数人是在1979年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狂潮中返回北京的。

在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北京五十五”们中大多数人依旧风光。家庭的背景和个人素质较高，加上在云南上山下乡的磨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鱼得水，有的在政界崭露头角，更多的是在商海遨游，踌躇满志。

刘晓航在撰写的《我们要回家》指出：“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会使他们成为‘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

冷静以后，这些上山下乡的先驱者是绝对不可能预见到，那个年代的“自愿”和豪言壮语，也是引发旷日持久，充满血和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整整一代人整体命运的大迁徙。

他们用激情抒写了自己的青春。无需责难，无需指责。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所有人是茫然的，知道真相的是船长！（大海航行靠舵手）如果说这种激情是无比正确的，为何在十年后都纷纷回到了出发地呢？也许在激情背后折射出了我们这代人的无知和愚昧！

不仅是“北京五十五”，上海有一批知青在毛泽东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的当晚，已经豪情满怀地在去云南的列车上了。也是自愿的。

一直到1971年，云南垦区一共接受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共计12万。其中北京8000人，上海47600人（包括上海郊县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2万余人，重庆24000人，昆明2万人。

到云南农场（农村插队）的知青12万，究竟有多少是自愿的呢？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你不自愿行吗？你敢不去上山下乡吗？

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往事，在1978年以后潮水般地回到出发地城市的知青们，难道不是对于这种被欺骗以后、被蒙蔽以后的“自愿”的嘲讽吗！

#### 四、说那个年代“分外红”是不是“自慰”？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为自己的昨天津津乐道。

四十年以后，我曾在上海奉贤的一个海湾园里建起的“知青广场”里参加了一次活动。那天来了不少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一面面红旗上写着上山下乡目的地的农场、军垦、插队的“符号”，似乎在告示人们昨日的辉煌？尤其是舞台正中央的那块横幅，上面写着“那个年代分外红”。我一惊！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那是十年浩劫啊！“红”了什么？果不其然，一会儿一群同龄人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在舞台上跳起了那个年代的“忠字舞”，唱着那个年代的“红歌”。眼前的场景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不肯回首的岁月里。难道还要回到那个“红”的海洋里遭受浩劫的苦难？

我选择了离开。我看见为数不多的人也离开了。

曾经的知青们，都是亲历者，脑子还没有糊涂，身子骨还硬朗，生活稍稍好了一点，怎么把昨日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了。难道你忘记了那个浩劫年代里，就是在这样一面面红旗下演绎的疯狂？当年红卫兵们以革命的名义殴打老师、校长，给一个个“走资派”挂上牌子的揪斗，无法无天的闯入民宅的抄家，肆无忌惮地举起皮鞭厮打教授、专家、学者，毁坏千年文物瑰宝。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处于一种“红色恐怖”之中。

那时是“自愿”吗？

那是一种被激起的愚忠啊！我们曾经的耻辱！

可惜都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



刘小萌教授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里尖锐地指出：“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前后衔接的这两场运动，在内容、形式、宗旨、作用上迥然不同，然而，由于它们都是以‘老三届’学生为主体，并以若干激进学生领袖为先导的，所以不难发现两者间在指导思想、动员口号乃至行为方式上的雷同。”

今天依旧沉浸在“分外红”之中的老知青们，难道忘记年就是打着“造反有理”、“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这些口号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了“分外红”，高喊着“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这些在今天看来滑稽可笑的一幕，何尝不是当年我们这代人自命不凡的真实脸谱？

如果没有健忘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记得红卫兵们批斗“党内走资派”的凶狠劲头，为了向伟大领袖表示我们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雄心壮志呢？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等等虚无缥缈的口号，自愿报名上山下乡，到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迷信与崇拜是红卫兵再次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

再次挖开这些“伤疤”，我们还自豪的起来吗？剩下的只有“自慰”。

## 五、曾经的“自愿”与今日的“自慰”！

我们曾经是那样的“自愿”，今天继续的是“自慰”。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代人应该“感谢”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感谢肯定是打上引号的。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暴雨骤雨，特别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唤醒了还存在良知的我们！上山下乡的经历，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以及对于各阶层人民的真正了解以后，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先前给予我们的种种灌输教育。

在思考的空间里赢得了觉醒，于是就有了1976年4·5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于是就有了1978年秋天的大返城，于是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再次奋起。

当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以后打开了国门，我们开始反省以前所憧憬的关于“革命事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每个人都发现原来自己肩上也长了一个脑袋，也可以自己动脑筋想问题，不能够以别人的思维代替自己的思维。

可惜，持续的时间不长。

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这代人都退场以后又看见了什么呢？

继续自吹自擂，自恋自爱。我们在自说自话：共和国的脊梁、共和国的第三代、为国挑担的老三届等等。在小说、电影、电视剧里继续洋溢着“青春无悔”的恋曲，一部《知青》电视剧里看到的是浪漫与快乐，唯独没有苦难。回忆录、展览会里展现的是战天斗地的激情、接受“再教育”的欢乐、在农村的建功立业。在一台台自发组织的文艺演出、学术研讨会里，以唱响“正能量”为幌子的歌功颂德、把苦难变成了美好，让后人得出了一个印象：那个年代确实“红”。在一片喧哗中，发明了“知青精神”，生怕所有人忘记了自己，一心想着青史留名。

为何不去反省一下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在上山下乡前，红卫兵丑陋的历史难道都忘记了？在上山下乡期间，从红卫兵到知青们究竟对于这个国家做了多少令人称奇的好事？千万不要忘记“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带来了“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曾经的“自愿”只是极少数人今日的“自慰”啊！

我们这代出生于50年的人，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眼下急需反思、反省！

~~~~~

【往事如烟】

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节选之二）

• 安文江 •

（编者按：本刊在《文革博物馆专集》第四十八期（zk9903d）节选刊载了安文江的《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一文的第5—9章和第10章的一部分。现在这里刊载第10章的其余部分和第11、12章。）

另一次，我去参加上海师院“红三司”女红卫兵E的追悼大会，她是在外地串联宣传最新指示被流弹打死的。我作了半小时声泪俱下的讲话，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但内心却有个声音在叫：“不值！不该！”她父母成分不好，主持人居然不让他们上台。我一拍桌子责令主持人去请。但她的爸爸摆摆手，她的妈妈摇摇头，我的心也铅沉一般……尚未泯灭的良知与“文化革命”潜意识的对立和抗争在炮打中寻到了喷发的裂隙。

1月中旬，我们复旦率先贴出了一批言词含混但所指明确的大字报、大标语：《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接着又贴出针对徐景贤等机关联络站的大字报，企图从这里撕开口子再攻背后的张春桥。复旦伤风，上海感冒，来看大字报的人比南京路上的人还多。张春桥一伙慌了。

大约是22日下午，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召集上海各群众团体头头开会，一个个点名要大家就复旦大字报表态，我虚晃一枪说：“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而周谷声、胡守钧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当天晚上，“机联站”二把手郭××把我请到他家里吃狗肉，他劝我：“徐景贤和我想让你进市写作班子，春桥、文元也没意见。不过，你现在没毕业又当着头头。毕业以后再说吧。”我不是傻瓜，这块诱饵我不会吞。郭××个性耿直，向来直来直去，那天说话却弯弯绕，我估计他是替张春桥、徐景贤当说客。

1月26日，“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三军倒戈，直接把矛头戳向张春桥：《再问张春桥二十个为什么》，《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不保》……从全市涌来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塞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轨电车出现通车史上第一个高峰。下午，张春桥应约到友谊电影院会见600多“红革会”战士，遭到长达六小时的围攻、训斥。同日，复旦“红革会”派兵奇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郭××，并关押在复旦外文楼。

28日夜，张春桥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军某师郭政委，动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2辆，三人摩托18辆冲进复旦园，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并对骚动的复旦红卫兵实施武力警告。

这显然是火上加油的败着。内战未息的三派在高压下迅即结成了“反张神圣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

深夜召开的全校大会群情激昂，吼声震天，那一天阴雨霏霏，可我浑身燥热。“妈的！把枪对准我们红卫兵等于对准伟大统帅毛主席！”我的几个朋友劝我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我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我急匆匆赶到大礼堂，和两天前还在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鼓动性发言。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大会一致决定：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反张示威游行。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

当时我很乐观，得意地认为，就凭我们的大示威就足以使张春桥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计错了。29日凌晨，“工总司”、“同济革”进入全面夺权阶级，红卫兵已是过山后的拐杖。已经失宠的我们纯粹是自作多情。

30日，我们赴京核实电报的真伪并伺机告状。先到北大找聂元梓，聂借口离不开会场拒绝见面。再到清华找蒯大富，蒯司令说电报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了句聪明话：“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上海能乱吗？”我茅塞顿开！上海已成夺权样板，张春桥是“一月风暴”的大功臣。现实需要他，他就倒不了！这就叫“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我够蠢够愚够天真的了！

其实，反思我所见过的政治斗争，从反右到“四清”直至“文革”，有多少实事求是？当时，我没有这份认识，但是，心冷了。人心一冷，脑壳也降温，这是“自我回归”的开始。

然而，“文革”不需要自我。八亿人一颗脑袋就够了。谁要自己的脑袋就得准备受批判！

1 1

2月3日回到上海，等待我们的是刷遍上海的大标语：“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绞死劳元一！”“砸烂周谷声！”“油炸安文江！”

先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我用了三个小时。郭××指示将我的检查录音翻印成册由大家评点，结论是“不是检查而是辩护词。”接着在文化广场召开近八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批判会。押上台的是我、劳元一、周谷声，主持人是郭××、徐景贤、王洪文等。然后，我被勒令到各高校巡回挨批，先到上海财院，再到华东政法学院……好在是“红三司”占绝对优势的院校，战友们对我很文明。上台前先打招呼：“说得过火处别放在心上，批判嘛。”在复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极少数看风派，极个别对中央文革怀着真诚感情的同学，谁也没想要和“坏头头”划清界限。在“红三司”整风会上，大家还叫我作动员报告。郭××气得骂：“怪事一桩！让安司令作整风动员报告，整谁的风嘛！”要在政治上搞垮一个人很容易，要在政治上搞臭一个人却很难！这大概是有某种规律的。

其实，我自己被昨天的我打倒了……我失去许多也得到了许多：我糊涂了不少也明白了不少。吃大亏换来个大明白：我没有脑袋！

虔诚的教徒有宁静的心境。癫狂的白痴没有痛苦的神经。我虔诚过，我癫狂过。一旦清醒，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这种痛苦由于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标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曾在3月初来看我，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呀！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他还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一伙公开反江青，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个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太多，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激起我强烈的共鸣，在我耳廓里震响了很久很久……

但是，小刘是高干子弟，这使我很难接受他的许多尖锐的观点。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说“母鸡司晨天下必乱”等等，这对当时的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我还不肯往更深层去想。也许是我多一点工农子弟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许是我对某些高干子弟有不可名状的反感——

1966年5月29日，创造“红卫兵”一词的是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最早抡铜头皮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高干子弟、最早杀向全国串联播火的是高干子弟……他们耳聪目明，他们悍勇敢斗，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最早感悟到“亡国亡党”的危险，于是最早喷发“誓死捍卫”的激情。他们具有“八旗子弟”的至尊心理，于是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要害是接班。他们自己是父辈打下的江山的当然卫兵，于是傲岸地宣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不乏虔诚和忠贞，也不乏桀骜和狂悖。当“文革”进入揭批资反路线阶段，狂流倒灌，野火反窜，乌纱纷纷坠地，大院阴风凄雨时，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父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自己由当然的“红五类”沦为“黑七类”时，他们像钱塘大潮汹涌而兴急遽而退。于是，他们最早撕毁红卫兵大旗，最早发起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冲击。待十年浩劫过去，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磨难中挺起了脊梁，一部分忙于营修失而复得的楼园，也有相当一部分声色犬马利用昔日的权势，父辈的威望，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这是一页某些人不愿或不敢过多翻阅的历史！我认为，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在中国这块宗法观念浓重的土地上剖析，不难作出公正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批红卫兵的重要群体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特别是在揪“三种人”时，大概因为退潮早而被遗忘。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这一条放在一般老红卫兵头上，够得上“打砸抢”吧？但是，报刊上出现的是对她的绝对正面的吹捧。我毫无将谁揪出来的用意，上帝最能原谅受骗的修女。但人人平等是必须的，这是民主政治的标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不得人心的封建制的残余。

炮打受挫后，张春桥指示复旦“重新组织队伍”。受命主持复旦工作的郭仁杰组织了旷日持久的“反逆流斗争”。我在六号楼阁楼上单身独宿，在迷蒙中寻找自己失落的脑袋……

1967年春天来了，复旦园还在凛冽的寒风哆嗦。郭仁杰假传圣旨说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有杀劲”，还说炮打张春桥“这笔帐一定要算”！（后来揪郭仁

杰，张春桥说他没传达过；而郭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记着“春桥同志传达……”）当时，我如堕冰洞，害怕在其次，主要是困惑。我搞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又不敢怀疑“最高指示”。第一次怀疑毛主席受了骗，可是“洞察一切”的导师会受骗？我迷糊了。心里空空荡荡的。3月底，我和几个同学悄然离开复旦到南方去游山玩水。全国大串联时，我们满怀政治热情留校闹革命，亏了。现在，憋在复旦挨整当然没有“忘情于山水之间”的洒脱与超然。

现在想想，我在“文革”中真该当一个逍遥派。在人人皆疯时，唯独逍遥派没疯——因为他们没有疯的资格。逍遥派基本上是被极左路线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于是，他们有条件、有时间走南闯北游览名山大川，或者躲在家里啃书本读外语，寄托被遗弃被歧视的灵魂。浩劫过后，“两派都应否定”，唯逍遥派不存在否定问题。因此，一查档案，他们的最清最白。提拔干部，选派出国，他们成了最理想的人选。我同年级同学中有几位处、局级领导干部，没一个“铁杆保皇派”，也没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别以为我当官不得发牢骚。不是！当初，一腔赤诚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工农子弟迄今还有相当一批人被沉重的档案袋压着。这使我想起，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他们得到了安置或当了什么委员之类的。宽容得到报答，豁达得到赞赏。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0年又2年，对他们20岁左右时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历史的恶作剧叫人啼笑皆非。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

我们一行偷偷溜出校门向南进发。浙江、福建、广州、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但是，南国春光，秀山碧水不但难以使我宠辱皆忘，相反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悲怆，又一次失落，又一次幻灭。

江南没有向我展示她的明媚秀色……广州白云山衣衫褴褛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平陆动物园门口，人民的警察用皮带抽打一位用石子丢过猴子的人民；阳朔的农田上蹒行着人拉的木犁；安顺饭馆内刚挥去嗡嗡叫的苍蝇又围上一大群要饭的孩子，川江岸边古铜色的纤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庐山脚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围观着一具倒毙的尸体……懂事后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贫穷、寒怆、凄苦的图景，我给震懵了！从小到大，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学的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推崇的作品是“童子面桃花开了”，“地球像颗红玛瑙”……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骂娘的冲动。想起闻一多的诗：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写于军阀混战时的《发现》竟和60年代的我产生共鸣，我惶悚，我困惑。我发现自己确是个十足的书生，以前的22年像浮在虚幻的云中，脚没有踩踏在沉甸甸的黑土地上。

还有更令人心悸的场景。

在贵州安顺碰到上海建材学校分配去的贵阳的同乡，他说了许多当地的落后、愚昧。在黄果树竹楼里，不少人家把毛主席像供在佛龛里点火跪拜，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菩萨；到重庆，恰遇“反到底”和“红成”械斗，当天又听到《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武汉，数万人在政府大院外静坐绝食，已有一名饿毙；……在九江我听说，赣州打派仗，被俘虏的冶院女学生押送农村，最“革命”的惩罚是蹂躏其身心……

这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就是“损失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这就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天真的我当时还害怕看到幕后的答案，努力用“局部的”、“暂时的”自解自慰。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是空洞的理论压不住的，我开始怀疑“安司令”的价值。

斗牛罢斗。陀螺减速。我在迷雾中求索。

1 2

4月底重返复旦园，我有一种回囚笼的感觉。樱花开了，白得像雪。草坪绿了，青得像铅。同学们都说我黑了，瘦了，消沉了，我只有苦涩地笑。

郭××找我：“你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立新功。”我心里想：包袱能放，轻装做不到了，许许多多的问号沉甸甸地压着我。

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五分钟，其中三分钟是请大家起立为罗文斌默哀。舍此，我还能说些什么？

冷眼向洋看复旦，复旦一片压抑的沉寂。坐镇复旦的郭××指挥棒失灵，“反逆流”阻力重重。为了控制学校运动，他炮制“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扶持所谓“轻舟派”，提出“归口闹革命”；出版《新复旦》，把我们比作阎王，提出“打倒阎王！”造反派红卫兵不甘沉默，针锋相对提出“让联络站见鬼去吧！”“保护革命小将！尽快解放一批头头！”于是，“保郭”与“倒郭”成了复旦的主要矛盾。其实“倒郭”是假，反张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张春桥的暗流正在沉默中汇聚、运行。校门口柏油马路上刷着两行石灰水写的大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正是复旦人情绪的典型反映。接着，有人贴出《复旦园里新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倒郭”由地下转入公开。

红卫兵是可悲的。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王洪文、徐景贤们的崛起，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退潮的颓势，再抗争也徒劳。

郭××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冷落、在市革会被排斥的怨愤却又秉承张春桥旨意挥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对我大发“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骚。不幸而言中，最后他被张春桥甩出来含愤自杀。他有所醒悟却为时已晚。

张春桥们扶植的红卫兵只有一类，即死心塌地地护卫他们的陈敢峰之流。陈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头头，以看风使舵出名。“文革”初期，陈丕显同志养病，他说“陈是毛主席肯定的红小鬼，不能动！”聂元梓到上海煽风点了陈的名，陈敢峰马上表态“和上海头号走资派血战到底！”1月26日，他打电话向我摸底准备炮打，他接管的铁路局已在北上列车两侧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一到，他最早组织宣传车到复旦狂

呼“坚决拥护张春桥正确领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上海人称他为“陈看风”毫不冤枉。可怕的不是投机者的存在而是他们被赏识重用。我想，假如陈敢峰不上大学，他只是个聪明的福建农民；假如他不搞投机，他只是个一般的技术人员……结果呢，青云直上，“市革会”常委、“红代会”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当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妹夫，银铛入狱一命呜呼！历史上，投机而得善终的为数寥寥。所以，做人还是率真坦诚为上。敢峰被重用对他本人是上火炉，对我却是个教育。我由此看透了张春桥一伙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镜子。

上海“红三司”仍认为我为头，但我消极怠工，大权旁落在他人的手里。我很悠然。复旦“红卫兵师”成立，我是常委兼管宣传，但我不管不问神游物外。我很坦然。

新我没有找到，旧我决不继续。这是一段空空落落迷迷沌沌的转型期。

大学五年级，按惯例7月分配。我只盼着早点分配，走向社会，对复旦已毫无眷恋之情。回想1962年8月第一次跨进校门时我那种欣喜的感觉，像逝去的幻景。五年，一场迷梦，一场恶梦。

可是，中央决定，大学生暂不分配，继续留校闹革命。又是一桶迎头冷水。继续一年？两年？天晓得。

我第一次产生对不起妈妈和哥哥的疚愧。我们班百分之七十的同学享受着助学金，而我这个经济条件偏下的没提出过一分钱的申请。总觉得党和政府送我上大学不易，能克服的就不该伸手。这份觉悟大大高于某些党员同学们。为了每个月15元5的伙食和杂用费，妈妈扳酸了指头，刚刚从师院毕业的哥哥作出了牺牲。原想读了五年走上工作岗位，让妈妈脸上多一丝笑意，让哥哥少一些拮据。而今还得“革命”，且是我渐渐厌倦甚至厌恶的“革命”。

我只有一种选择：混！

忘我的狂热消淡，自我得失的盘算增长，当时还有腆颜，现在想想倒是跨跃后的后缩，未必不是进步。

我是汪洋中的一滴水，基本成分是H₂O，和别的水没本质区别，但主客观原因使我1966年跃上涛头，1967年又跌向浪谷。也许，我的跌宕幅度大些，但红卫兵的际遭是类似的。狂热—迷茫—震惊—压抑—自省—清醒—抗争……是大多数红卫兵的共同心迹。

复旦没有平静过，校内的“反逆流”，“倒郭”斗争，“打杨”战役，“红复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联司”之争，对“市革会”的冲击……时阴时雨，就是没有晴天。从押上文化广场那天起，我再没写过一份大字报，偶而也到一些高校走走，上台发一通很应时的讲话，但“文革”初期的热情锐减。五角场饭店倒不时光顾，没有酒量，一杯啤酒下肚，晕晕乎乎蹒跚走回校园，真有点宠辱皆忘。毛选不太读了，报纸不常翻了，有时敞开鸭嗓唱几段京剧样板戏，声音倒像野狼嚎。

1967年11月4日，空四军组成所谓军训团团进驻复旦。他们给学校的公开信中称：“我们军训团的全体同志，一定拜你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你们学习，做你们的小学生。”我心里明白，这只是挑在刀尖上的假面具。红卫兵挨整的新时期到了。像无汁可榨的甘蔗渣，我这个甘蔗渣、红卫兵是进垃圾筒的时候了。他们进校三个月，我这个兼管宣传的

“红卫兵师”常委一直与他们藏猫猫。作为军人，他们无愧是长城的砖石，作为人，他们也不缺七情六欲，但是，空四军作为林彪的直控部队，又受制于张春桥，他们进复旦是狼外婆敲门。果然，进校不入，他们秘密成立了“安文江专案组”、“胡守钧专案组”，为开刀准备砧板了。

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会宣告成立。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他对挨复旦炮打耿耿于怀或者说心有余悸。他说：“小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不知不觉地侵蚀到我们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来，它可能变幻形式，花样很多的，变为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欢的毒蛇……我们要准备垮台，有了这个准备就不至于垮台。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准备就不至于分裂。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有神经的人都听得话中暗藏的杀机，文笔很精的张春桥居然在贺词结尾处使用这等冰冷的语辞，这绝非疏忽。

但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我理应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说我“闹情绪”，这也不算冤枉我。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组成，我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解释说：“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我直视着他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这句话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鲁迅骂过的汉奸早已不是秘密，张父张开益出身地主任过军阀军职我是听市委某同志私下议论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头说一句“要正确对待”就走了。我心想：我够正确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头因拇指砍伤破伤风去世，祖母28岁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儿送给一户村夫当童养媳，自己携儿子到上海当佣人。我父亲16岁当工人，以后当海员，40年代中期因轮船公司裁员，失业回舟山，迫于生计当了年余税收员，挂过没子弹的驳壳枪，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定海庆祝会上，他和游行一起的确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历史问题？！哈！蒯大富说得妙：“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张春桥等人在上海，我安某人绝无出头之日。所以，谋官而不得的情绪本人没有，由此遭人议论或者怜悯的忿满绪倒是有的。新闻系某君劝我：“会还是去开，否则老张会怎么想？”我说：“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呗。”掩饰自我充当人生大舞台的演员，比如说满脸嗔笑地上台对张春桥说：“您好！”这需要高超的技艺。我没有，至今也学不会。为此吃了许多亏，还是学不会。

在这一年中，我过得稀里糊涂，也不想多说，震撼全球的武力镇压“上柴联司”前夜，我接到总部电话，说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我提不起劲来没有去。第二天凌晨我去“市革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人指挥的这场血战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械斗，组织者竟是“工总司”（实际指挥者是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对“联司”，我的观点是模糊的。我不是支联派，“红三司”的多数持反联态度，支持“东方红”。但对他们反对“市革会”，隐射张春桥又觉得快意。第三天，张春桥说：“砸司联当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车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说：“看起来，上海市民挺身高兴的嘛。”意思是说，毛主席支持砸“联司”，这一笔历史血债谁又敢算。不过，我怀疑老张扯虎皮，因为毛主席一贯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演化为血流成河的惨剧显然有悖他的初衷，他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运动。

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逆转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只充当了热情的观众，幕后的鼓吹者，没有公开跳出来疾呼。是胆怯？是保张？不是。教训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没有中央表态也没有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史问题”、“现实问题”都压不倒他。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量，以为打倒“走资派”成立红色新政权有我们群众运动的大功

劳，其实，我们只是被少数人作为“运动群众”的对象而已。如列宁所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我们却把口气当作力气，想谁翻一切，创造一切。智者的无知！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的时候了。”人民日报说：“对于红卫兵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己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毛主席随即发表“要斗私批修”的著名号召……。温度越降越低，态度越来越严，直到1968年7月把大学红卫兵们贬为“臭老九”，工宣队开进了复旦园。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没落期！

当然，那时的我全没有“打狗棍”的清醒意识，只有涩的敏感。敏感积多了成不满。不满积多了变成牢骚。牢骚不敢发作便退隐、逍遥。逍遥的最佳选择：谈情说爱。

□ 来源：1989年5月《东方记事》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